

## 伊斯兰教与全球软环境治理

## 文明对话视角下的回儒对话

丁克家

**摘 要：**文明对话是当今世界全球化时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崭新的学术论域，也是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群体之间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学习、和睦相处的一种人文精神和学术实践；文明对话的提出，是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必然需求，同时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拨正与回应。近10年来，回儒对话作为文明对话论域中的重要学术论题，已在中国学术语境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回儒群体及其思想贡献的总结与回顾，是为了更好地阐发其宝贵的历史学价值及其时代意义，为建设和谐美好的世界提供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经验的精神资源和人文参照。因此，回儒对话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将是持久而深远的。

**关键词：**文明对话；回儒对话；本土经验；伊斯兰文明；人文参照

**作者简介：**丁克家，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宁夏银川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3-0073-08

**中图分类号：**D815.373

**文献标识码：**A

文明对话是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地带的一个崭新论域，文明对话的提倡与理论探索及其人文实践，是人类文明面对全球化时代多方面严峻挑战的积极回应，是对人类文明自身在发展中的反思与自省，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美好前景的展望和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之一。

文明对话是基于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特征而提出的：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强化，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企业及其营销战略，从发达国家一直延伸到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和角落，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标准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其次，以互联网、移动电话、影视媒体、电子信息为主体的高科技通讯手段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为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传播和共享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便利条件，人类高科技文明的成果在人类社会的共享度有了极大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再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的流动频率不断加快，不同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传统的熟悉的居住环境，不断地走进或接纳一个不同族群、不同信仰者所属的“陌生”环境，人们或自觉或被动地感受着、适应着不同的跨族群、跨宗教边界的社区和社会场景。因此族群的多样性、宗教的多元性特征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共识。而族群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增加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者相互熟悉和沟通的同时，也因为对彼此文化传统、思想意识、心理模式等方面深层次交流的不够，导致相互之间的理解偏差和误读，也造成当今世界一系列人为的矛盾和冲突，对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构成许多挑战。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

相互学习和彼此的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显得尤为重要，文明对话就是顺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而提出的具有鲜明人文价值的理论探讨及其学术实践活动。



文明对话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历史发展史实的尊重，更是对当代人类社会不同文明传统的共通性和独特性的理解和尊重。同时，在人类文明奔腾不息的长河中，作为文明发展活化石之一的不同文明的表述工具——语言以及观念世界的深层表达——宗教，是最具文明内涵特质的表现形式之一。自1948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轴心时代文明”观点以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热烈讨论，也引发了中西理论界对破除“欧洲中心论”，平等、客观对待非西方文明的科学研究取向的思考，进而对宗教文化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思考和深入研究。南亚的印度教（Hinduism）、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中国的儒家、道教，再加上中东的犹太教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乃至源远流长的希腊文明，都应该是面向21世纪现代文明的重要资源，应该得到深度挖掘，并努力地去继承并从中创造新的价值。因此，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塑造人类文明的人物，如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等所积累的智慧对我们现在面向21世纪还有非常深刻的意义。<sup>[1]3</sup>所以，从不同文明的形成和丰富的历史积淀中，从每一个文明成熟过程中那些具有原创意义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智慧与伟大心灵中，汲取思想和智慧的灵感，挖掘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清泉，以惠及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后来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则是文明对话理论与实践的源头。

从国际学术界看，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中曾明确指出，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不一定接受美国所主导的西化过程。世界的文明是多样的，而这多元多样的文明中有两大文明，对于美国所代表的路线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有深厚的文明基础，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儒家文明。从文明冲突论的角度讲，儒家文明以中国为代表，伊斯兰文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代表。在亨廷顿看来，有两个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敌人，一个是伊斯兰所代表的原教旨主义，进一步说就是暴力及恐怖主义；另一个就是儒家的威权主义，具体讲是有软性的威权主义和不太软性的威权主义如中国。这样看来仍是敌我分明。亨廷顿甚至认为美国一定得靠敌人才能调动它的积极性。<sup>[2]52</sup>所以，冷战时代美国的敌人是前苏联；后冷战时代则是推向冲突前沿的伊斯兰世界和潜在的中国，二者被认为是美国前进和发展进程中最大的威胁之一。

其实，伊斯兰文明自创传之日起，就与西方世界和西方文明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暂且不说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是一根而发的三种一神论宗教。如果没有阿拉伯人把古希腊的哲学带到西方基督教世界，那么西方基督教世界就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也没有办法发展启蒙即西方的现代性。因为阿拉伯的知识水平很高，无论是数学、科学还是经典诠释方面的人才都很多。希腊哲学不只是保存在阿拉伯的文献之中，而且被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讲活了；从某种意义上看，三大宗教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共处是在伊斯兰世界，在穆斯林王朝建都科尔多瓦的西班牙时代，穆斯林与其他信仰者的和平相处、相互尊重的短暂历史史实给后人留下了难忘而光辉的一页。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流的事实表明，二者的相互学习和相互理解与沟通不仅停留在宗教信仰观、价值观和仪式体系上，而且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有交流和互通有无。但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入侵与掠夺，

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受制于西方，也远远落后于西方；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世居家园上建立国家，几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造成了旷日持久的阿以问题，给中东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苦果。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变得恩怨难解、扑朔迷离、复杂多变。多种因素、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矛盾冲突与此息息相关。而且这些矛盾冲突还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更增添了无数的变数。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社会的整体落后与西方世界的发达繁荣，形成巨大反差。这些差距也通过多种形式折射在双方社会的多种层面，而非仅仅所谓的宗教或文化层面，更不是危言耸听的所谓“文明冲突”。

同样是东方古老文明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世界在近现代有着相似或相同的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命运。中华文明的荣辱兴衰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以儒家文化为典型代表的中华文明对塑造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精神世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历时性影响。特别是自清代以来，中国多元一体的格局，对塑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认同、族群和谐共进观念十分有利。所以，在文明对话的理论探讨中，主要涉及三大文明的相互关系问题，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等的关系。在这种多层次复杂的关系中，要求我们在探讨任何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并进行交流时，一定要有多种不同文明之间多重关系及其背景的文化参照，否则只会陷入文明孤立主义，而不是在多重关系、多角关系的文化场域中进行平等、客观、理性且尊重差异的文明对话。在中国的历史场景中，以儒家为主导的汉文化与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群体所拥有的文化之间，历来都有良好的相互学习、沟通与理解实践，如唐代中央王朝与吐蕃民族的友好文化交流，蒙元帝国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以及清代康乾盛世时期，内地与新疆各民族之间的良好互动与多层次友好交流，为建设国泰民安的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而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穆斯林中的一批“回儒”，兼通“四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以渊博的知识身体力行，在积极推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理解与沟通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学术贡献，受到后世的广泛赞誉和一致推崇。

## 二

回儒对话是文明对话论域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开辟的一个全新学术领域，通过系统和客观地总结明末清初汉文译著家——“回儒”群体的思想智慧、文本著述和实践探索，采用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视角，从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来观照回儒的历史贡献，并探讨他们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其价值在于，不仅从宗教、哲学、思想与文化的高度对这些历史贡献进行重新诠释、阐发其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思想智慧为资源，更好地进行时代性理解，从而超越文化的误解和“文明冲突论”，进而为国内不同族群与不同信仰者之间的文化沟通、理解与共同和谐进步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文明对话的落脚点是对话的视野、胸怀与眼光以及多学科训练的学养等基础性条件。我们与其将对话作为解释我们自身立场或表白我们自己信仰的机会，不如将它视为扩展我们的视野及文化意识的机会。对话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倾听的艺术，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互动，我们才能够作为合作伙伴开始相互理解，以便容忍、认可、尊重和欣赏对方。通过个人、地方、国家、地区以及国际层面的对话，我们可以培养一种和平的文化。只有在一种和平共处的氛围中，在解决全球社群中的共同问题时，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才是切实可行的。文明冲突的修辞已经褪色，即使冲突迫

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对话也是必要和可欲的。<sup>[2]52</sup>所以，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尊重差异、相互倾听、共同进步等理念是文明对话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回儒对话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之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回儒对话，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进程。关于“回儒”，有些学者认为其似有两解：一是具有穆斯林身份的儒生、儒士，如马承荫所说的“若岱與王先生，回儒”（马注，“指南叙”）；二指伊斯兰思想与儒家思想。本文所论述的“回儒对话”则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回儒”，回儒对话系文明对话的体现，它反映了国内不同民族（汉族和回族）之间（通过学者）的对话。<sup>[3]</sup>

1993年，针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杜维明、孔汉思、纳斯尔为代表的世界著名学者，倡导和践行文化对话，在不同的宗教信仰、文明的内外部之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彼此对话和理解，从而为文明的和谐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智慧性知识和精神性资源。在21世纪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以杜维明为代表的学者，先后倡导哈佛大学与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多次联合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如2002年8月8~10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了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18~21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了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南京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自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6月16~18日，在云南昆明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南京大学、云南大学联合主办召开了“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6月11~14日，在南京大学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南京大学联合主办召开了“文化理解与文化对话的百年进程”为主题的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文明对话为论域，以回儒对话为重点论题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积极展开，自2002年南京会议算起，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学术探讨与实践历程。近十年来，以杜维明、村田幸子、杨怀中、朱威烈、华涛等知名学者为代表，引领中国宗教学界、民族学界、国际关系学界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促进中国主流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及其文化的丰富性、民族性、地域性给予关注和探讨。他们在促进中国学界对世界范围内的丰富多彩的伊斯兰文化予以关注和研究的同时，推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对广大伊斯兰世界的多层面交流与文化理解，进而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中国学术界应有的努力与贡献。近十年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断努力，已取得了以《刘智的先贤知识：儒家语境中的伊斯兰思想》（村田幸子、威廉·柴提克、杜维明合著：《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为国外的标志性成果，在国内有《回儒对话：天方之经与孔孟之道》（刘一虹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月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前景》（马明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王岱與思想研究》（金宜久著，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版）等著作的出版，都反映出国内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从2003~2006年，南京大学主办的国内著名学术核心期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先后开辟“文明对话研究”专栏（2003年第1期、第4期，2004年第1期，2005年第1期、第5期，2006年第3期），刊发的论文从多学科、多角度对文明对话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向度的探索与研究，先后共刊发15篇包括杜维明先生在内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得到许多学术界同仁的赞誉。由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人文核心期刊、民族学类核心期刊《回族研究》，也先后不定期地开辟“文明对话”、“回儒对话”、“了解伊斯兰”等栏目，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并在社会学术文化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应。还有《阿拉伯世界研究》、《西亚非洲》以及相关的高校学报等学术期刊，也陆续刊发了

一些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推动文明对话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论域的关注和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sup>[4]</sup>

自明代中期中国穆斯林著名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年）开创经堂教育以来，中国穆斯林在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科举制度的框架下，开创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穆斯林教育形式——经堂教育体系。从那以后，凡是中华大地上有清真寺的地方，就有规模不等、大小各异的经堂教育之地，为中国穆斯林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爱国爱教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中的精英人物如王岱舆（约1570~1660年）、马注（1640~1711年）、刘智（约1660~1711年）、马德新（1794~1874年）等，在精通伊斯兰经典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以精深的儒学功底，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学术规范和范畴，来阐释伊斯兰的微言大义，通过描述这两大古老东方文明的内在文化血脉和精神基质，在中国思想史、伊斯兰文化史、中国宗教史、世界宗教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中文译著”财富。这一教育学术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近现代，尤其出现了以哈德成（1888~1943年）、王静斋（1897~1949年）、达浦生（1874~1965年）、马松亭（1895~1992年）为代表的“四大阿訇”，以及像马坚（1908~1978年）、纳忠（1909~2008年）、纳训（1911~1987年）、白寿彝（1909~2000年）等一批穆斯林知识精英，深受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熏染，进一步将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学术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也将回儒对话及其实践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自17世纪中期，王岱舆发起的回儒对话在后来几代人不断得以推进，并为中国穆斯林与主流儒家文化的知识学习和文化理解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所以后来的学者如桑田六郎（Kuwata Rokuro）等人将他们称之为“回儒”群体。<sup>[5]584-588</sup>到18世纪早期，刘智作为中国伊斯兰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出现后，将两大文化的交流、理解、融通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刘智的出现，象征着汉语伊斯兰的文艺复兴。在刘智所阐明的思想主题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尤其引人入胜。而在他对于真主理解的本体论和知识论说明中，《中庸》的宗旨也是一个突出的特色所在。《中庸》所体现的人类参与宇宙创造性的那种天人一体观（anthropocosmic），成为刘智融汇伊斯兰教和儒学的支撑。”<sup>[6]177</sup>可以说，王岱舆、刘智等人是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完成了文明对话的学术工程的。

### 三

回儒对话是明末清初由王岱舆、刘智等穆斯林学者身体力行的一次文明对话运动，它达到了伊斯兰汉语表述体系的一个时代高峰。从历史进程看，17世纪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史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一是因为17世纪初苏非主义从中亚传入，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以伊禅派为主的苏非主义的本地化和学理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二是因为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群体及其文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在汉语语境中的发端和生成。这些穆斯林学者大都对伊斯兰经典、教义学及其哲学有深入的把握，同时通晓儒释道，是中阿兼通、“学通四教”、“长攻儒者之学”的“回儒”。从源头上来看，“他们的译著‘悉本尊经’，参考了伊斯兰原典及其不少苏非典籍，在他们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大多采用了使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以儒诠经’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sup>[7]757</sup>从此，“回儒”作为中国穆斯林特有的知识精英群体，登上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舞台，成为中国

传统哲学思想与伊斯兰哲学思想比照同行、融通交汇的开创者、传承者。从文明对话的视角来看，“回儒”群体既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承续者，又是两大文明的理解者、阐释者，其时代性的努力及其学术成就一直影响到 21 世纪。所以，在 1630 年和 1730 年之间的一百年间，被当代西方学者称为是“中国穆斯林学术的空前爆发时期”<sup>[8]124</sup>，显示出回儒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建设和穆斯林社会的深远影响。

从回儒们创作的文本著述来看，他们既是身体力行的伊斯兰文化的践行者，也是伊斯兰文化在汉语语境中的表述者，更是对中国伊斯兰与穆斯林生存境况如何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开展两大文化对话与理解的思考者、探索者。从回儒的文化背景来看：首先，他们拥有良好的伊斯兰文化知识的熏陶和实践，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的原典经训的学习，以及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典籍及其传统精神的陶冶，使他们通过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典籍系统而深入地了解 and 掌握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及其精髓；其次，他们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知识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对中国文化典籍及其哲学思想、伦理等方面的知识，有着娴熟的理解和把握，包括对中国本土佛教、道教的了解和熟知，使他们能够在多种文化背景的交织参照中，不断地推进回儒对话的进程；最后，他们留下的丰富文本和思想智慧，以及他们身体力行文化对话和沟通理解的实践精神，也为今天的文明对话、文化理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照。

回儒对话作为文明对话论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作为文明对话在中国的理论性探索与实践的主题之一的回儒对话，需要我们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视野、掌握多学科前沿动态，深化对回儒对话的时代性价值的认识。同时，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和理论实践，发掘中国多元一体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价值，从学科建设、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实践创新上不断拓展和深化对文明对话、回儒对话的理解、认识和面向未来的创新。

回儒对话需要对以往宗教对话的理论探讨与研究前沿有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回儒对话的理论支撑是世界范围内由来已久的宗教对话理论、文化对话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如果没有对世界性的宗教对话历史、理论、范畴以及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就很难对文明对话、回儒对话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宗教对话是开展文明对话的关键环节之一，宗教对话需要我们在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寻求“可能的共同之处”，而且躬身实践，才能够实现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建起我们的神学语言、术语、范畴和形象。而这共同的人性是我们所有人——传统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当代批评的思想家、印度教徒、佛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运用这样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语言，我们就能将我们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洞见有条理地加以表述。而这只能靠超越出——却并不放弃——西方文化，超越出犹太教、基督教、西方人道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吸取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等的洞见才能实现。这只能靠对其他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艰苦的学习‘完全进入’其内心深处，耐心而深入地与其对话才能完成。”<sup>9[82]</sup>

回儒对话需要立足于中国经验与本土知识。中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间一律平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到今天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中国现代化的近百年来，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理念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20 世纪五十年代初对中国 56 个民族的识别和划分，以及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与发展，促成了中国现当代多元民族文化和睦相处、融通的现实进程。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

事关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宏业。中国有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文明对话和回儒对话的积极开展，使学界不少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及其整体的理解和认识，目前仍然缺乏深度研究和阐释。特别是目前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界，似乎都以对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传播、发展与表现特征的阐发，来涵盖和代表中国伊斯兰的整体面貌。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这种局限和不足将会挑战中国伊斯兰学术界、文化界的研究路径、研究视野以及研究质量。

从历次召开的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看，文明对话论域的开展，不仅是学界和学者的理论与文本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从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种学术胸怀、学术视野与学术实践，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不同宗教信仰者、族群之间相互认识、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彼此平等善待的一种文明精神及其实践。所以，近期文明对话的理论探讨及其实践，逐步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些共识，即坚持文明对话的三原则：第一，文明对话不是单方面的说教或单方面的倾听，而是参与对话者，无论来自何种文化背景，都需要平等善待对方、平等倾听对话的话语，在理解他者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反思自己的同时，更好地理解他者；第二，参与文明对话者，要怀有一种耐心、低调的人文姿态，对不同文化，既要洞察其“熟悉”的方面，更要熟悉“陌生”的方面；尽量搁置或摒弃原有的认识预设，对他者及其文化能够“换位”认知与理解，从而达到心对心的理解；第三，应关注和重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问题：首先，因为长期以来，主流思想家较少关注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理解、沟通与对话论域；其次，中国有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各个穆斯林民族的广泛参与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文明对话、文化理解的领域和论题不断拓展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总而言之，从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说，要不断推进文明对话，就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和专业人士，共同协商和携手共进，进行良好的学术设计，站在时代的前沿，汇通东西，超越“文明冲突”论，高擎“文明对话”的人文大旗，坚持不懈，奋发有为，力争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我们相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保护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如同保护人类环境生态的多样性和谐发展同样重要，而要发展和维护好人类文明的多元和谐、相互依存发展的前提，就是不同文明背景影响下的民众，能够彼此平等地尊重、相互地学习、深入地理解和多层次的沟通，善于践行文明对话及其精神。所以，学术界和学者在推进文明对话的进程中担当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文明对话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拓展，也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积极而有益的贡献。

#### [ 参考文献 ]

- [1] 杜维明. 序：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杜维明.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 彭国翔, 编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 [2] 杜维明.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杜维明.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 彭国翔, 编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 [3] 金宜久. “文明对话”·“回儒对话”与王岱舆//“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南京[C]. 2002.
- [4] 哈佛—燕京学社. 文化理解与文化对话的百年进程——第四次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10.
- [5] 桑田六郎. 明末清初之回儒//李兴华, 冯今源. 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M]. 安慕陶, 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6] 杜维明. 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二: 中国传统中的回儒对话略说//杜维明.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 彭国翔, 编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7]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8] Zvi Ben-Dor Benite. The Dao of Muhammad: A Cultural History of Muslim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斯维德勒. 全球对话的时代[M]. 刘利华,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The Dialogue of Hui-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DING Kejia**

**Abstract** The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is a new academic field in the global era, and it has enhanced the understanding in each other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religious groups. As a newly academic topic, the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has adapted well to the developing of the economy, technology and multi-cultures in the global discourse, and it has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academic context. The dialogue of Hui-Confucianism will improve th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harmony between the Hui Muslims and The H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se academic practice and spirit is the valuable resources of the local experience and humanism in the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Dialogue of Hui-Confucianism; Local Experience; Islamic Civilization; Humanity Reference

(责任编辑: 李 意)